

史語所一生的栽培—— 專訪陳仲玉先生



陳仲玉先生自述學思歷程
(李修平提供，攝於 2022 年 10 月 18 日午後)

李修平 整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1 期 2023.12

李修平訪問，李修平、沈耘、鄭好倫紀錄，李修平整理編輯

訪問日期：2022年10月18日、25日

訪問時間：14：00-17：00

訪問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3218室「臺灣與東南亞考古學研究室」

一、兒時回憶

李修平問（以下簡稱李）：非常感謝陳先生接受我們訪談。首先，可否請您聊聊兒時回憶？

陳仲玉答（以下簡稱陳）：我生於一九三四年。^①出生三年後，中日戰爭爆發。我是福建人，生於福州市。我的祖父經商，父親在教育界工作。當時，福建最有名的是廈門大學，不過，福州沒有大學，只有一個學院，叫協和學院，外國人辦的。後來，福州有一個教育學院，前身是教育職業學校，我父親就在這所學校做事。

七、八歲時，大概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左右，亦即二戰末期，日本人曾兩度攻進福州。由於福建山區居多，交通不便，以前只有鷹廈鐵路，^②因此，日本人無法在福州一帶用兵，去一下就走掉。所以，當日本人一來，父親就帶全家逃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兩次逃難。當時向閩西的沙縣、三元一帶逃。福州市有一個小碼頭，叫「洪山橋」，專用於內江航行。我們就在那裡乘船，沿著閩江往山區走。那些船尖頭縮尾的，為蟹民所有。我們兩度往西逃難，都是坐蟹民的船。他們每次出發，一定會有三到五艘船。因為一艘船最多只能坐四、五個人，所以我家分乘兩艘。河道兩旁均有灘頭。由於船逆水而行，到了河水湍急之處，撐篙撐不上去，就要拉繃。拉繃時，大家都下船，包括客人，目的是減輕重量。有時候，男客人也要幫忙拉繃。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坐在前面一艘船。當時船擦到岩邊，破了一個洞，河水湧進船，她全身都濕了，只好趕快把船拉到岸邊。接著先把所有貨物卸下，然後等船補好，船隊再一起走。

李：當時逃難的人應該很多。

陳：我也不清楚，因為都零零星星。大概只有公教人員，還有些有錢人。

* 李修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安陽工作室負責人，沈耘、鄭好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工作室勞務承攬人員。

** 本文圖1~20為陳仲玉先生提供。

① 陳先生生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但報戶口時有誤，晚報一年多。因此，他的身分證登記的出生年為民國二十四年（1935）。

② 從江西鷹潭到福建廈門，全長705公里。

第二次我們回福州時，很有意思。我們先到一處有岩石的沙灘，船就停下過夜。隔天早上再走。由於坐了三、四天船，大家都很累，所以希望能到比較大的城市休息，就決定去南平市。到達目的地後，大家上岸一看，嚇呆了，因為南平市所有的店鋪都關了門，而且街上滿地都是密密麻麻的鞭炮屑。我們就問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不曉得啊，日本人投降了。」那一天，是八月十五號。由於前一天晚上，我們停在河灘旁邊過夜，所以根本不曉得南平當夜全城的人都出來狂歡，慶祝日本投降。那天真是非常高興。

一家回到福州後，一九四五年，我父母親就跟隨長官來臺灣工作。我則留在福州繼續讀小學，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之後，就進入初中。初中只唸了一年，第二年還沒唸完，但由於當時局勢不好，父親就叫我來臺灣。那年是一九四七年，我才十三歲。

到臺灣後，我在屏東市立第一初級中學唸二年級，然後就上屏東中學。^③由於我父親是公務員，所以他認為，男孩子高中畢業就可以出去工作。可是，我還想要唸書。當時，全臺灣只有一所大學，就是臺灣大學。此外，臺北有臺灣省立師範學院，^④臺中有農學院，^⑤臺南有工學院，^⑥還有一間行政專科，也在臺北。^⑦一九五三年，高中畢業後，我決定考臺大，但沒考上，父親就幫我想辦法。那時，他在公賣局工作，就問屏東酒廠的廠長。剛好酒廠的人事室需要人。不過，由於我只是從普通高中畢業，沒辦法考高普考，因此，我後來就以普通工的名義，在酒廠的人事室工作。

在酒廠做了一年，我想，再這樣耗下去，前途無望。而且。我還是想考大學。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叫董明明，他考上臺大心理系。他跟我說：「你上臺北來吧。我的宿舍有空位，你可以在這裡住，去補習，然後找工作。」於是，我就決定來臺北。

二、入所考試

李：可以請您談談進入史語所的經過嗎？

陳：上臺北後，我發現工作很難找，到處碰壁。就連送報紙也不成，因為我要自己找五十個客戶，怎麼可能？不要說高不成，就連低也不就。有一天，我在看《中央日報》時，突然發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徵人啓事，要徵繪圖員。由於報名與初試的考場就在臺大，所以，同學鼓勵我試試。於是，我就去報名。負責報名的辦事員是吳緝華（1927-2010）先生。他說，來報名要先交兩張圖。一張是地圖，我會畫。但另外

③ 即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④ 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⑤ 即國立中興大學。

⑥ 即國立成功大學。

⑦ 即國立臺北大學。

一張是器物圖，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我問吳先生器物圖要怎麼畫？他拿了一本史語所的出版品給我，裡面有器物圖。我一看，唉唷，是這樣喔，就是畫小點的那一種，^⑧我怎麼會？於是，我就跟他借書，照書上的圖描一描。因為我不知道怎麼點，工具也不全，只好畫一張素描的器物圖。

還記得考試那天，外面下著大雨。因為我不會畫器物圖，心想沒希望了。本來要放棄，不過，同學卻催促我出門，還借我雨衣跟雨鞋。最後，我還是去了。參加考試的人只有十四位。考試的內容，是畫一件打製石器。由於時間很短，不可能有時間畫點點，所以就拿鉛筆畫素描。我運氣很好，是備取第一名。後來，就進了史語所。那年是一九五五年。

李：您提到考試時是備取第一名。那麼，為何能進入史語所？

陳：當時，所上所有人員，都在一座倉庫裡上班。據我後來得知，本來，招來的兩位畫圖人員，一位是溫學儒先生，另一位的姓名我不知道。聽說，這位先生到南港一看，發現史語所的工作人員，竟在破爛的倉庫裡上班，跟他想像的中央研究院完全不同，所以他就告退了。由於他不做，所以我才以備取第一名進所。^⑨

三、關鍵五分鐘

李：所以您在一九五五年就順利進入史語所。

陳：其實，在我正式入所前，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接到錄取通知後，我就到南港報到。我的職位是安排在第四組，也就是人類學組。到南港後，接待我的是石璋如（1902-2004）先生。石先生說：「在正式工作前，你還是去看看你的主任芮逸夫（1899-1991）教授。」

芮先生的研究室在臺大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於是，我就跟芮先生約早上九點，在他的研究室見面。那天，我跟同學董明明一起去拜訪芮先生。我們九點鐘到了以後，請考古人類學系的事務員周宗德先生，幫我進去通報一聲。他說等一等，芮老師馬上出來。等了半個小時，芮老師還沒出來。所以，我又請周宗德先生再幫我問問。周先生說，芮先生請我再等一下。因為芮先生研究室的旁邊，就是日本時代的「土俗人種學講座陳列室」，我就跟周先生說，想去裡面看看標本。要是芮先生一出來，就請他通知我們。我跟董明明就進去參觀，看得很過癮。不知不覺就看了兩個鐘頭，到了十一點半。沒想到，芮先生的客人還沒走！我就跟董明明繼續等，等到十二點。

^⑧ 即「點繪圖」。

^⑨ 陳仲玉，〈史語所遷南港的第一倉庫〉，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1009-1014。

我們一共等了三個多小時，兩個人都不耐煩了。董明明說，他要走了。我說，好吧，我們再等五分鐘。如果芮先生五分鐘內不出來，我們就走，我也不幹了。才剛計時沒多久，芮先生送一位客人出來了。一看到我，他吃了一驚說：「啊？你還在！」因為我等了那麼久，所以他馬上把我引進他的研究室。所謂的面試，其實是芮先生向我講述中央研究院以前在中國大陸時，是個有五百多人的大機構等等。他似乎怕我不想做這分工作，所以就向我解釋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性。講完後，他就要我去上班。第二天，我就提了行李，正式到史語所報到。

李：要是這「關鍵五分鐘」不小心過了，您大概掉頭就走，也就不會留在史語所。

陳：應該就拒絕不來了。我曾經把這個小插曲，告訴張光直（1931-2001）先生，說我等芮先生等了三個多小時。張先生說：「一點都沒錯，我相信！」後來，我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讀研究所時，曾修過芮先生的「中國民族學概論」。這是門六學分的課。芮老師講課時，非常熱情，經常忘記下課時間，學生也不敢講，直到超過半個小時，才有學生說：「老師，我們應該下課了吧？」芮老師才會說：「喔，過了半個小時。好好，下課。」以前的老師們，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四、繪圖經歷

李：剛剛提到，您在進史語所前就會畫地圖。您是怎麼學的？

陳：我還在福州時，曾上過一名地理老師的課。他教學生畫地圖，就是把不同的省分與地區，塗上不同的顏色。大概是為了想瞭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對畫地圖很有興趣。

李：進史語所後，您的職務是繪圖技佐。請問，您的文物測繪技術如何習得？

陳：前面提過，我其實只會畫素描。所以，史語所要求畫點點的器物圖，是我入所後向其他前輩請教的。教的最好的就是黃慶樂先生。當時，潘實君（1906-1969）先生¹⁰擔任技正，已經不畫圖。繪圖人員有黃慶樂先生，跟之前提到的溫學儒先生。後來溫先生改配到第四組，也就是人類學組。至於考古繪圖，大部分都是黃先生跟我畫的。不過，因為老先生覺得我比較勤奮，另外，我的技術不如黃先生，所以他們大多交代我做雜事。要學黃先生的技術，非常不容易。黃先生是對日抗戰結束、史語所遷回南京後進所。但確定的時間我不曉得，總之，是在史語所遷臺之前進來的。當時，

¹⁰ 即潘懋，字實君。傳記見石璋如，《殷虛發掘員工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頁293-302。

會把行政技術人員帶來臺灣，一定是技術很棒。黃先生是老資格，技術很好。侯家莊跟小屯的材料，差不多都是黃先生畫的。我畫的很少。

後來，石璋如先生又找了一位繪圖員，就是吳文彬（1923-2013）先生，北平藝專畢業。他的年紀比我大，原來是跟著軍隊來臺灣，在空軍。吳先生進所比我晚得多，大概是一九六〇年代晚期。當時，吳先生年近五十，他是陳奇祿（1923-2014）先生介紹來的。石璋如先生很欣賞他。吳先生學的是工筆畫，還有人物畫。石先生在整理敦煌石窟的材料時，全靠他。吳先生進所時，我已經不畫圖，而是做李濟（1896-1979）先生的助理。



圖 1：黃慶樂（右）與陳仲玉（左），1960 年代



圖 2：1977 年考古組同仁在考古館前合影
（石璋如，前排左四；高去尋，後排左二）

高去尋（1910-1991）先生也請過兩位繪圖員，陳壽美女士先來，後來又請了劉秀文女士。我跟陳壽美女士共事過，她比吳文彬先生還早，應該是一九六六年以前入所，也畫侯家莊的材料。她好像學的是服裝設計，會素描。後來辭職。整體來說，侯家莊畫的最多的應該是黃慶樂先生，陳壽美女士也幫忙，還有後來的劉秀文女士。吳文彬先生只畫小屯。

李：所以您的文物測繪技術，可以說是跟黃慶樂先生學的嗎？

陳：其實，就是看他怎麼畫，自己琢磨，依樣畫葫蘆。因為我跟黃慶樂先生在同一間辦公室裡，他的桌子就在我的旁邊，所以，有時候我會轉過頭去，看看他畫的。潘先生偶爾也會教，就是口頭講講。不過，如果他講得我聽不懂，就還是不懂。

李：您剛提到，後來因為處理行政事務較多，就不畫了。所以，您大概畫了幾年？

陳：大概畫到一九六〇年吧。

五、紐約世界博覽會

李：一九六四年，您曾代表史語所，參加在美國紐約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可以請您聊聊這段經歷嗎？

陳：那一年的世界博覽會，在紐約市皇后區（Queens）的法拉盛草地公園（Flushing Meadows Park）舉辦。世界博覽會從十九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斷，戰後又恢復了。當時，臺灣很多人的家裡就是家庭工廠，還有人買了尼龍織布機放在家裡，成了一間間的小工廠。所以，我國參加紐約世界博覽會的目的，就是要走市場經濟，希望把這些產品都外銷出去。

在紐約世界博覽會，我們蓋了「中華民國館」，是一座大型宮殿式建築。一層好像城門樓，有三個圓拱的門，正面一個門，左右兩邊各一個門。裡面一樓的展示室全是商品。不過，因為商品實在很少，所以就展一些紡織品、宮燈之類的工藝品。甚至，還弄來一輛裕隆汽車，放在那裡展覽。二層樓就布置成一個中國傳統的家庭，有客廳、起居室、書房，讓觀眾可以瞭解中國文化的日常生活。在二層樓與四層樓中間，有個夾層，沒有窗門，就是三樓的博物館，天花板很低。為什麼博物館在夾層裡面？因為比較安全。只有一個入口，一個出口，而且沒有窗門。我們的古物都在裡面。四層樓是辦公室，沒有開放。

整體而言，我們的展品不多，而是以博物館的收藏品取勝。紐約世界博覽會剛開始時，原本只找了國立歷史博物館，但東西不夠精彩。於是，就找故宮博物院、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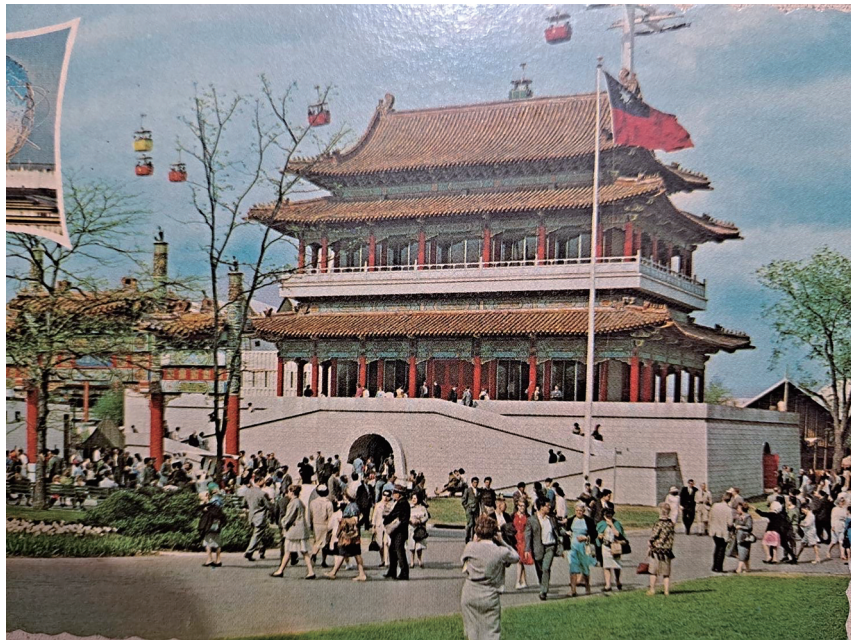


圖 3：1964-65 年紐約世界博覽會中的「中華民國館」

研究院、中央圖書館，請幾個單位提供展品。因為在規劃展覽時，包括了中國文字，才想到史語所收藏的甲骨文，包括龜甲與牛肩胛骨各一件。至於藝術品，則想到殷商時代的那一隻大理石虎爪人身石雕。¹¹ 史語所就展了這三件東西，都歸我監管。歷史博物館展的是熹平石經，中央圖書館是以「中國文字的發展」為主題，展出善本書，而故宮博物院則是一些圖書、繪畫。

紐約世界博覽會的第一年，從四月初開始，一直到十月，開放半年。¹² 因為十月以後冷的不得了，而且下雪，幾乎沒有人要去那個公園。臺灣派去紐約參加監護展覽文物的人，我是最幸運的一個。其他單位因為要去的人多，所以要分配，就是一批人去八到十個月，結束後換另一批人去。史語所因為只派我一個人去，所以我在紐約待了二十一個月。除了負責文物監管工作，期間，我也到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修課。那時，我心裡還是很想繼續讀大學。這也成為我回到臺灣後繼續升學的契機。

李：原來如此。等一下再請教您的求學經歷。不過，話說回來，當年這批古物如何運到美國？

陳：對，這是另一段故事。原來，已經安排好要坐飛機送古物過去。那麼多東西，一定是用貨機送。出發前，突然，華航有一架飛機出事了，栽了！這可不得了！

¹¹ 即「石虎首人身跪姿立雕」(R001757)。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140-141，圖版 121。

¹² 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展期，分為兩個部分，即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到十月十八日，與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到十月十七日。

可是，要是找別國的航空公司送，價錢很貴。當時，越戰剛開打，美國的船隻不停的運送人員與物資去越南。先從美國舊金山奧克蘭海軍基地到夏威夷，從夏威夷到日本橫濱港，再從橫濱港到臺灣，最後進入越南。或許還去了香港，我不確定。總之，最後到越南的胡志明市，當時叫西貢。所以，政府就找美國人幫忙，希望利用軍艦送古物。於是我們就坐「蓋飛將軍號」(USNS, Gen. Hugh J. Gaffey)軍艦去美國。

李：就只有您一位坐軍艦去？

陳：不只我，還有兩位。一位是故宮博物院的李霖燦(1913-1999)先生，另一位是歷史博物館的何浩天(1920-2009)先生。後來，這兩位都成了大人物。李霖燦先生後來是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何浩天先生則做了歷史博物館館長。我們三個人就坐軍艦，押送文物，一路經過日本橫濱、夏威夷，最後到了舊金山的奧克蘭海軍基地。

李：坐一趟船要多長時間？

陳：十九天。坐這一趟船很有意思，會經過國際換日線。過了那條線就差一天。在船上，我還參加了一場海葬典禮，是一位美國軍人在他的遺囑中交代的，要將骨灰送到海裡，就在國際換日線。典禮結束後，艦長簽了一張「金龍王證書」給我。那個地方，是金龍王(Golden dragon)管理的。這是一張很寶貴的證書，不過現在找不到了。

後來就到了夏威夷。這是我第一次到美國，也是第一次出國。因為，故宮博物院的李霖燦先生人脈很廣，所以到了夏威夷後，就有一位華人女畫家來接待我們，也到當地的博物館看一看。隔天，就離開夏威夷。後來，到了舊金山。在奧克蘭海軍基地上岸後，有一位中華民國館的辦事員來接我們。因為我們的東西很多，花不起飛機錢，所以我們就用火車押運。首先，把古物裝進一個專門的貨櫃車廂。然後，看著車廂鎖起來，打個印。我們就坐在前面的車廂，貨櫃就在後面。就這樣，一路走了三天兩夜，才到紐約。

中間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火車途中曾停在芝加哥，但只有四十分鐘。因為李霖燦先生很想去看一座博物館，問我要不要去，我說好。當火車一停，我們馬上下火車，叫了計程車，衝到博物館參觀。去程五分鐘，回程也五分鐘。所以，博物館大概只看了三十分鐘不到，就又趕快上火車。我們當時真是博物館狂啊！

六、居延漢簡坐軍艦

李：對了，之前聽所上的資深研究員提過，您曾將現藏於本所的居延漢簡，從美國帶回臺灣。這件事，跟您參與紐約世界博覽會有關嗎？



圖 4：何浩天（左一）、陳仲玉（左二）、艦長（右二）與李霖燦（右一）合照

陳：有關係。一九六五年十月，世界博覽會結束。當時，我們已經閉館，東西也已經封好，準備回國。在回國前，差不多還有五、六天空檔。由於紐約世界博覽會雇用了 Pinkerton 這間保全公司，看管我們的東西，而且史語所的東西只有一箱，因此，所裡指派我一項任務，就是去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把漢簡拿回來。

這批漢簡是在對日抗戰期間，大約一九四〇年左右，由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1891-1962）先生，¹³ 安排運到美國，並暫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這一次要我把漢簡帶回臺灣，是所裡的李濟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1898-1990）先生的想法，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也放了一些中央圖書館的藏書。中間的過程，可以看邢義田先生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還用了我當時向所裡報告、給汪和宗先生寫的一封信件。¹⁴

去華盛頓時，我代表史語所，另外有一位張東哲先生，他是國立中央圖書館的代表。我們先到中華民國大使館的文化參事處，由鮑幼玉（1924-2004）先生協調處理這件事。鮑先生後來回到臺灣，做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校長。鮑先生非常能幹，他是文化參事，陪著我們去美國國會圖書館，見了圖書館的伍德（Wood）主任。伍德說，存放的東西，從一九四〇年到現在，一直就放在地下一個恆溫恆濕的保險室裡，從來

¹³ 胡適先生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出任中華民國第三任駐美大使。

¹⁴ 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21-952。

沒動過。因為從沒打開過，所以裡面是什麼狀況，他也不知道。我去看，有十四個箱子，都是以前旅行用的手提箱。每一個箱子外都綁了一條繩子，上頭打了一個火漆印，沒有開過。我看到火漆印，當然就相信伍德的話，於是就把這些箱子運回大使館。搬運時，我一抓箱子的把手，沒想到就斷了。原來，把手不是皮的，都是紙做的。我想，這些東西要怎麼運回臺灣？後來跟鮑先生商量，我說一定要先改裝。他說，他會。於是鮑先生馬上找個木匠，依照裝漢簡箱子的尺寸，做成三個大木箱，把原來的十四箱漢簡，全部裝進去。後來，這批漢簡從華盛頓運到舊金山的奧克蘭海軍基地，再坐「蓋飛將軍號」軍艦回臺灣。

李：史語所原來在中華民國館的展品如何處理？

陳：當然，我不能夠不照顧史語所的東西。美國國會圖書館除了有漢簡外，還有中央圖書館的書，不曉得多少本。所以，當時就把漢簡跟書，裝成一個貨櫃車。張東哲先生去押送那個貨櫃車，也走了三天兩夜。我就回到紐約，去看管史語所的展品。然後，就與故宮博物院的沈景鴻先生一同坐上火車，到舊金山跟張先生會合。我們坐的是「蓋飛將軍號」。我在臉書（Facebook）上，曾經寫過坐軍艦這一段故事。¹⁵

東西運回臺灣後，在基隆下船。因為這些展品來自四個單位，還有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跟中央圖書館，所以展品運送就兵分多路。我們的東西少，因此研究院就雇了一部小貨車，把東西運回院裡。當時還有憲兵押運、警察開道。漢簡到史語所後，政府召集了七、八位代表，監察院、立法院都有，監看我們開箱。因為開箱後，要看看有多少包、多少件，所以慢慢開，大概有兩、三天吧。

七、擔任史語所助理

李：您之前提到，曾當過李濟先生的助理。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陳：我做李濟先生的助理，是從一九六六年。剛剛說過，在兩年之前，也就是一九六四年，我代表所上參加紐約世界博覽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我從美國回來。我做李先生的助理，大概是隔年春天。李先生原來有一位助理，是一名臺大的研究生。他碩士畢業了，李先生就安排讓他去留學。這位學生離開後，李先生又找了兩、三位助理，都不滿意。後來，就把我調去做他的助理。他從此就沒有再請別人做了。

李：所以，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左右，也就是您不再繪圖，並且尚未擔任李濟先生助理的這段期間，您在所上協助處理各項事務。

¹⁵ Jonas Chen, 〈米老浮生瑣記 36：快樂就是搭美國軍艦橫渡太平洋〉（2022.07.19 發表）。

陳：那個時候，考古館倉庫的東西都亂放。所以，我幫忙整理器物。另外，還接待外賓。當年的研究院，只有這麼一個稍微大一點的陳列室。許多有名或重要的外賓造訪中研院或史語所，多要來參觀我們的陳列室。

李：整理器物的工作有哪些？

陳：比如說，把小屯與西北岡的材料分類。當時，還有許多材料裝在箱子裡，尚未整理。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先打開箱子，然後裝進櫃子。原本沒有系統，我慢慢把這批材料整理起來。

除了整理器物，我也整理老先生的文稿。由於他們鼓勵我寫文章，所以我也開始寫，主要是跟李濟先生學，也正因為如此，就比較傾向古器物學的研究，包括盃形器、匜形器。

另外，有一陣子，因為我發現我們的青銅器鏽的太厲害了，就是淡綠色的鏽，鏽的裡面都掏空了，形成一個大洞，非常可怕。所以，我就去做維護的工作。在《大陸雜誌》，我寫過一篇青銅器維修方法的文章。¹⁶

八、銅器修復

李：您當時應該修了一些所上的銅器。在您之前，還有其他前輩修過銅器嗎？就是把破碎的銅器，重新拼合修復？

陳：這項工作我就不太清楚了。當時，我只關心鏽得很厲害的銅器。發現淺綠色的鏽，我就處理它，因為我知道這是非常嚴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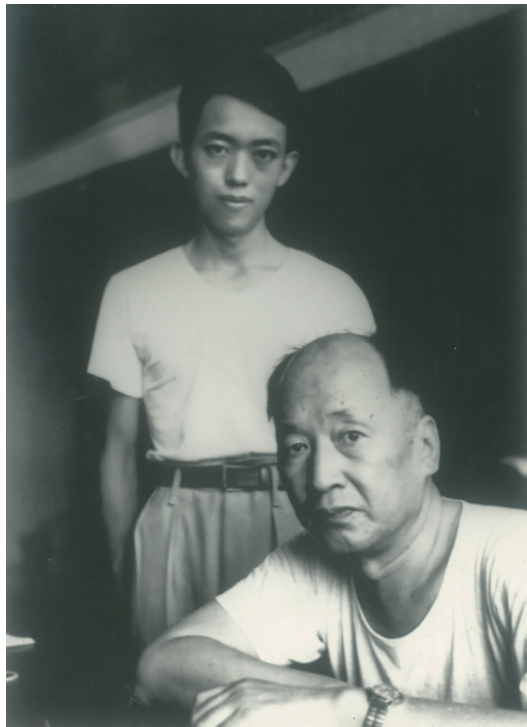


圖 5：李濟先生與張光直先生

¹⁶ 陳仲玉先生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任史語所助理研究員，此前發表的研究論文共有十篇，包括：〈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3（1969）：455-496；〈「青銅病」的現象及其處理方法〉，《大陸雜誌》41.7（1970）：1-9；〈論宋代金石學之發達及其價值〉，《食貨月刊》復刊2.9（1972）：18-30；〈先秦相官名號〉，《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1974）：247-260；〈青銅盃形器的研究〉，《大陸雜誌》48.4（1974）：5-33；〈記鄒討鼎之一複器〉，《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7（1974）：31-32, 92；〈青銅匜形器的研究〉，《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4（1975）：33-65；〈談「金石」與「篆刻」〉，《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1（1977）：26-38；〈論中國青銅器的起源〉，《故宮季刊》12.4（1978）：11-21；〈殷商裝飾藝術中的眼紋〉，《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9（1979）：27-39。



圖 6：吳健雄院士（左）與吳大猷院長（中）參觀我所文物，陳仲玉（右）接待

李：您是怎麼學會這套除鏽方法？

陳：我是自己學的。我找了一位有化工、化學背景的助理。另外，我去看英文書。當時有一本很有名的經典之作，我就根據這本書，一步一步嘗試去鏽，然後修復。我在舊的考古組樓上，成立一個化學實驗室。我在那裡專門處理青銅器的銅鏽，還有修復。所以，不做繪圖員之後，我還做這項工作。

李：所以，所上考古文物維護的實驗室，算是由您開始的嗎？

陳：我創立起來的。高去尋先生是當時的考古組主任，而我剛好正在幫忙整理材料。看到青銅器壞的這麼厲害，我就向高先生建議，一定要有一個實驗室，專門處理青銅器的銅鏽。然後，我就去買了前面提到的經典英文書，是 ICOMOS（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出版的。ICOMOS 是個很有名的機構，關心考古遺址與文物維修。原本，我們沒有機會接觸這個機構。但是爲了處理銅鏽，我就寫信去問他們。後來，那本書的作者，不但訪問臺灣，還來看我。因爲我寫信跟他聯絡。所以，我那時修復青銅器，是自己看書，自己嘗試，然後就寫信問他。如此來來回回，從他那邊學到一些方法。

李：他哪一年來臺灣？

陳：唉，現在都忘了。我很遺憾，我一生都不寫日記。做研究人員以後，因爲下田野，所以才寫田野日記。另外，在華盛頓，有個很有名的機構，就是 Freer Gallery of Art，有位維修人員，就是 Tom Chase，我跟他熟，有信件聯繫。他也來臺灣，大概是一九七五年？訪問我們所。

李：這些信件都還在嗎？

陳：那個時候怎麼會看得起這些信件，都不留。現在想想，很可惜。



圖 7：Prof. Neal Barnard（左二）與 Dr. Tom Chase（右三）訪問我所時，萬家保（左一）主持座談會。張世傑（左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臧振華（右一），陳仲玉（右二）。

九、同事交往

李：您於一九七九年，擔任本所的助理研究員。在此之前，可以聊聊您跟同事之間交往嗎？

陳：平常上班，我接觸的只有考古組的同仁。我的辦公室一直都在繪圖室，甚至後來我做李濟先生助理的時候，還是在那裡。所以，最熟的朋友就是黃慶樂先生與吳文彬先生。劉秀文女士進所後，高去尋先生就另外安排她的辦公室，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黃慶樂先生是廣東人，不過為何跑到南京進入史語所，我不曉得。他人很好，太太也是福州人，所以我跟他們夫妻倆很熟。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都非常守規矩，上班就上班，下班也不串門子。所以，同事接觸比較多的機會，就是參加康樂會。比如說，我們時常一起下棋、聽古典音樂。另外，還有平劇社，我沒參加。其實，黃先生都不參加這些康樂會，但是兒童組的活動，他的孩子會參加，他都帶著他們來。

大概在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前期，一年之內，全所會有好幾次大型聚會。有人從國外回來，我們歡迎他，大家聚會。還有資深人員過壽，我們幫他慶生。

甚至還包括管理員。考古組有一位胡占魁先生，也是史語所在南京時期進所的，沒結婚，一個人，很寂寞，所以大家每年都給他祝壽。

以前所裡的活動還多一點，大家的凝聚力好一點。後來，每個人的辦公室一分開，互動的機會很少，只有講論會時，研究人員必須出現。

早年，因為中央研究院只有我們一個所，所以只有所慶，沒有院慶。後來研究所雖然多了，但也沒有人慶祝院慶。所以院慶不熱鬧，倒是所慶熱鬧。



圖 8：1994 年史語所同仁慶賀石璋如（二排右五）、陳槃（二排左四）、王叔岷（二排左三）三位先生嵩壽

十、師大求學

李：您在擔任本所助理研究員之前，曾先後在師大與臺大唸書。可以請您先聊聊在師大唸書的回憶嗎？

陳：我是一九六七年開始在師大唸夜間部，一共唸了五年。這一段是最艱苦的時候。一方面，我的孩子還小。我到美國參加紐約世界博覽會回來時，兒子才四歲，然後我進師大。進師大時，女兒剛出生。另一方面，我還要上班。當時我做李濟先生的助理，非常痛苦，等一下要講。上班時有工作壓力，而且在下班之前，一定要完成

工作。幸好，我家住在研究院附近。所以上課之前，我會先回家吃晚餐，然後去趕交通車。那時候的交通非常難！不過有一條線，正好到師大。晚上六點上課，九點半下課。然後，又要趕十點十分的最後一班公路局班車回家。一定要趕上，趕不上就回不了南港。

那個年代，一個禮拜要上六天的班和六天的課。禮拜一到禮拜六，滿滿的都是課。還要上國文、英文、軍訓、四書，都是必修課。師大雖離中研院很遠，但我從不蹺課。另外，禮拜天都不讓我們休息，還有週會，還有體育。下午上完體育才能回家。所以，一個禮拜去學校七天。我老婆真是非常辛苦，她什麼都得做。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個過程還是蠻愉快的。因為，這五年算是給我相當嚴格的訓練。一方面是學校的訓練，另一方面是李濟老師給我的訓練。

十一、任李濟先生助理

李：可以談談您做李濟先生助理的經過嗎？

陳：我在師大上課時，李濟先生是所長，¹⁷他有一輛專用的小包車。當時，他每個禮拜一與禮拜四上午會到所裡。禮拜二、禮拜三、禮拜五則在臺大。到所的兩天早上，他都會給我指示。他不是寫那五本書嗎？¹⁸還有寫論文。因為他的時間很擠，所以，早上八、九點會交代我找資料、寫東西，可是，快十二點時就會打電話問我，交代的事情處理好了沒有？我幫他找的資料找到了沒有？你想想，時間這麼短。所以，如果我要是沒什麼可回答的，交代不過去，他就會不滿意。他沒有很兇，可是我見著他就怕。

李：是嚴肅吧。

陳：他非常嚴肅。李先生不在所上的時候，我就做他交代的事。另外，還要幫石先生、高先生的忙，有時候也要接待客人，到文物館參觀。不論如何，至少在禮拜四這一天，李濟先生交代我的事要有點結果。那個時代沒有電腦，沒辦法下載資料。所以，我找到資料就抄給他。另外，他寫了稿子後，我就幫他謄，謄好的稿他就收回去。所以我沒有留下他的稿。我就這樣做了李濟先生六、七年的助理。

一九七二年，我從師大畢業，李濟先生也卸下所長的工作。可是，不知為何，後來我就被看成了「李派人物」。

¹⁷ 李濟先生於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任史語所第三任所長。

¹⁸ 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殷虛出土青銅斝形器之研究》（臺北：中

十一、臺大求學

李：在臺大唸碩士班有哪些回憶？

陳：一九七六年，我到臺大讀碩士班。老實說，能夠進臺大，真是我一生非常重要的轉捩點。我從高中畢業，就想進臺大。可是因為沒考上，所以才進來史語所。本來我想，這一輩子是跟臺大無緣了，太難了。後來，我考臺大的碩士班，沒想到，我很幸運，一考就考取了，名次還不低。考取臺大當然是非常榮幸的事。但是，壓力也很大。不過幸好，那個時候，我有三位恩師，都對我非常好，恩重如山。

李：哪三位？

陳：第一位是李濟先生。我做他的助理，其實就是訓練我。能當李先生的助理是一件非常榮譽的事。第二位，就是高去尋先生。他一直培養我，也鼓勵我。當我考上臺大碩士班後，就面臨要不要從史語所辭職的問題。可是，我有一大家子要養，怎麼能辭職呢？高先生知道後，就把我的情況跟當時的所長屈萬里（1907-1979）先生說了，¹⁹請他想想辦法，准許我帶職進修。屈先生也是我的恩師，他非常好。爲了我的事，屈先生特別去找院長錢思亮（1908-1983）先生，說我已經有學術研究的成績，不可比照研究人員的待遇。錢思亮先生是臺大的老校長，他聽屈先生這麼一說，也就准許了，同意我用對待研究人員的辦法，帶職進修。

當時，李濟先生已經退休了，所以我不再是李先生的助理。那麼該如何「帶職進修」呢？高先生跟我說：「你呢，雖然去臺大唸書，但不能不上班。要是你不上班，開了先例可不行。還有，現在很多人對你眼紅的不得了。比如說，因爲之前派你去美國參加博覽會。如果你現在帶職進修，還不上班，這可不行。這樣好了，因爲你是研究生，沒有多少課。所以，要是上完課，就去上課。沒有課的時候，就回來上班。你以前做過李先生的助理，那麼，你之後繼續做助理。」

我一想，覺得高先生的話很對。於是，我就去買了一架摩托車，方便去臺大上課，也方便下課趕回院裡。不過，高先生知道後，又叫我趕快把這輛車子賣掉。我說：「什麼？我剛剛才買啊！」他說：「趕快賣掉！你有這一輛車子，要是上完課不回來，人人都有話講。要是你沒有車子，下午上課，你就坐交通車出去，再坐交通車回來。反正交通車回來晚了，就回家休息吧。」

李：高先生都幫您想好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殷虛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

¹⁹ 屈萬里先生於一九七三年一月至一九七八年七月任史語所第四任所長。

陳：所以，高先生真是我的恩師。另外，因為我在師大不是學考古的，所以，到臺大唸碩士班時，要我補六門大學的課，人類學與考古學都要，一共三十六學分。那個時候，研究生原本就要修三十六學分，我又要多修三十六學分，一共七十二學分。我每一堂課都全勤。所以，我在臺大三年，真的很累。不過，這也是很好的訓練。

在唸碩士班時，我上了芮逸夫老師開的「中國民族學概論」，是大學部的課。另外，也修過李濟先生開的「先史學」，這是他最後一次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開的課。我是他的助理，也是他的學生。當時修李濟先生課的學生，我記得，還有劉益昌先生，他當時大學四年級。李濟先生同意讓大學部高年級的學生修他的課。另外，還有歷史系的學生來上課。不過，上課學生不算太多。當時上課，都在李濟先生家裡。他一直住在溫州街16巷，是4號還是6號，記不清楚。他家對面，就是彭明敏（1923-2022）的宿舍。在彭明敏家門口，固定停了一臺吉普車，車上有軍官，二十四小時輪班。所以李濟先生說，他家非常安全，不用擔心小偷。

李：您在臺大唸碩士班時，指導教授是宋文薰（1924-2016）先生。他對您的治學有何影響？

陳：我本來想請李濟先生指導我。不過，因為當時李先生身體不好，所以我一進臺大唸碩士班，就請宋文薰老師當我的指導教授。宋先生是很嚴肅的人，我不太好意思找他。當然，我還是會去請教他。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做的還是器物研究，不過不是中國考古，而是臺灣新石器時代的打製石斧。²⁰我一邊上課，一邊蒐集資料。也就因為跟著宋先生做碩士論文，所以我開始研究臺灣考古。

對了，我之所以到臺大唸碩士班，在某個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不得已」。原來，我從師大畢業後，高去尋先生跟我說，只要我再等個三、四年，然後發表一些文章，就可以提名改為研究人員。結果，當我的案子提出來後，有些人不同意。但是，他們要是投反對票的話，不就不給李濟先生、高去尋先生面子嗎？所以，他們就提議將我的案子「緩議」。結果，大家都同意「緩議」。我一想，通過了「緩議」，那麼何時才能「複議」？要是沒有把握，我怎麼敢提「複議」呢？所以，我想改為研究人員，大概遙遙無期了。後來，我考慮了一番，心想若要突破這個局面，唯一的辦法就是唸研究所。唸研究所可能要辭職，但我不管了，先考上再說。所以第二年，我就去考臺大研究所，沒想到一考就上。後來畢了業，我再提改為助理研究員的案子，他們就沒話可講，所以幾乎是全票通過。

話說回來，在我唸碩士班時，由於大家都知道我在上課，因此，所上安排給我的工作也比較少。所以，我的事業，真是史語所栽培出來的。不過，我不是前無古人，之前早有先例，比如李光濤（1897-1984）先生。

²⁰ 陳仲玉，〈臺灣史前打製斧形石器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後來想一想，我覺得很後悔的一件事，就是沒有接下來唸博士。唸完碩士後，我想，成為助理研究員就好，完全沒有繼續唸博士的打算。但是人生很奇妙，有得有失。



圖 9：臺大人類學系考古學師生與日本今村光麟教授及其友人合照。
石璋如（二排左三）、高去尋（前排中）、宋文薰（前排右一）三位師長。

十二、國家公園考古學

李：有得有失，怎麼說呢？

陳：雖然沒有唸博士班，現在想想有點可惜，不過，因為我碩士畢業後，順利成為研究人員，也開啓我新的研究方向。當時，臺灣正好在推動興建國家公園，而我則剛成為研究人員，所以，內政部就找我，協助考察、評定臺灣的考古遺址。當時的內政部民政司司長是居伯均（1927-1993）先生，主管國家公園事務。

一九八一年，政府開始規劃成立第一座國家公園，也就是墾丁國家公園。不過，當時的國家公園委員會，只想到生態保育，沒有想到保存人文史蹟。後來，當要成立第二座國家公園時，也就是玉山國家公園，委員會才發覺，在玉山國家公園規劃的區域內，包括了原住民的部落，是布農族的。委員會認為，既然有原住民，就不能不調查。因為我已在協助內政部調查考古遺址，所以他們就找我幫忙。我原本想，這件事跟原住民有關，應該要由民族所來做，特別是黃應貴（1947-2022）先生，因為他研究

布農族。所以我去找他。黃先生說，他隔天就要去英國，而且要去一年。那怎麼辦呢？後來一想，因為這項工作，不光是布農族的調查，還是原住民的問題，此外，還有歷史古蹟，是考古學的問題。因此，我就去找臺大的曾振名副教授商量，我們兩人合作，由我做計畫主持人，他做協同主持人，一起接下這個計畫，做人文史蹟調查。

在計畫正式開始之前，委員會組了一個隊伍，想先上玉山看看，於是就邀請我參加。其實，我從未登過山。不過，既然答應參加，我不管了，就去買一雙登山鞋，一些裝備，然後就上玉山。第一次上玉山，有兩名原住民替我們背東西。另外，還有兩位女性原住民，在山上專門為我們煮飯。我們這群人上高山，沒有人會煮飯；就算煮，也煮不熟。我們從嘉義上去，就是阿里山這邊的塔塔加鞍部上去，從東埔下來。中間有一個林務局的工寮。我們在那兒住一個晚上，還開party，大家一起跳舞唱歌。後來，就開始跟曾振名副教授合作的調查計畫，我也爬了好多高山做調查。



圖 10：1980 年首次調查，登上玉山主峰
（陳仲玉，前排左三）

完成玉山國家公園的計畫後，接著就是陽明山、太魯閣，還有金門國家公園，都是由我做人文史蹟調查。話說回來，假如我去唸博士，恐怕就不會參與這些國家公園的調查計畫。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關鍵。不僅開始了人類學的研究，也認識到自然保育的重要性。當然，我也藉由這些機會，認識很多好朋友。

李：您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臺灣考古。成為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後，因緣際會，您做了國家公園的人文史蹟調查。所以，研究臺灣考古學，是您轉任助理研究員後的規劃嗎？

陳：其實不是的。我正式成為助理研究員後，石璋如先生與高去尋先生原本希望我做漢代考古。倆老認為，安陽的材料由他們處理，一位研究小屯，一位研究侯家莊。安陽研究完成後，接著做周代。商周適合連在一起做。由於漢代考古沒有人做，所以原來安排讓我來研究。至於臺灣考古，原來是準備讓臧振華先生做，只是當時臧先生還在哈佛大學讀書。

李：所以，雖然您在臺大碩士班研究的是臺灣考古，不過老前輩們本來要安排您做漢代考古。

陳：對，是這樣子。不過，我覺得有點困難，也跟石先生談過。一是我們沒有相關的田野工作。二是如果要做漢代考古，等於是我的研究得完全依靠「特藏書」。當時所謂的「特藏書」，就是特別想辦法從中國大陸買來的書，一般人無法輕易得到。這些書是向香港轉買來的，而且不見得齊全。所以我就跟石先生說，漢代考古恐怕做不下去。

一九七九年，我從臺大畢業，然後改為助理研究員，接著就參加了國家公園的調查計畫。所以，我完全沒有研究漢代考古，就跳到臺灣考古。當時，國家公園的計畫每年不斷，有時候，一年還同時執行兩個計畫，太多了。我之所以做臺灣考古，就是這樣開始的。

李：所以，可以說，您成為史語所助理研究員後，研究的領域是臺灣國家公園考古學嗎？

陳：對，臺灣國家公園考古學。對我個人來說，這段時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一方面，我的研究領域，從商周考古慢慢進入臺灣考古。另外，我開始關注自然環境。考古學的訓練，本來就是多學科的整合。而考古學研究最不能夠分開的，就是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國家公園成立的目的，是以環境保育為主，當然重視自然科學，包括地理、地質、動物、植物與生態環境。所以，當我參加國家公園的調查工作後，許多經常接觸的各行專家，都變成好朋友。對於一個考古人來說，這等於開了另一扇門。



圖 11：太魯閣國家公園富世遺址調查



圖 12：金門國家公園的調查，首次使用透地雷達探測

十三、曲冰考古

李：曲冰遺址的發掘，應該也是您研究生涯中相當重要的一段。可以請您談談嗎？

陳：曲冰遺址的工作，跟我調查國家公園的人文史蹟有關。以前，有所謂的「中央公僕自強活動」，也就是政府鼓勵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員，可以到外面走走，所以在暑假舉辦自強活動，其中一項是「楓葉谷健行隊」。這個活動推出後，我一看內容，正是我想去的地方，就特別有興趣。

我在臺大寫碩士論文時，研究的是臺灣史前時代的打製石斧。當時，我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庫房裡蒐集資料，找到許多石斧標本，每一件我都看過。我發現，有些標本來自「姊妹原」。由於這個地點的名稱實在太怪了，所以，我就去查「帳簿」。原來，是馬淵東一（1909-1988）先生蒐集的材料。在日治時代，總督府爲了研究臺灣原住民，曾派馬淵東一到處調查。在調查過程中，經常發現史前器物，尤其是打製石斧，還有一些陶片。因此，這些材料，其實是研究臺灣原住民的「副產品」，就算拿回來也沒有人研究。我在臺大庫房找到的石斧，外面原來還包著紙，其中一些紙上寫著「姊妹原」。我猜，這些紙可能是當年馬淵東一蒐集這批石斧時原來的紙。一看到是馬淵東一蒐集的材料，我就去查「姊妹原」的位置。原來是在濁水溪上游，就是在霧社、萬大、武界這一段，中間有「姊原」跟「妹原」。

由於「楓葉谷健行隊」正好要到霧社，從武界一直走到萬大電廠，一共十六公里，於是我就報名參加。這應該是一九八〇年的事。我剛從臺大畢業，擔任本所的助理研究員，受到內政部的委託到處調查，也開始進行玉山國家公園的研究。後來我到當地去做研究，本地人還說，不只有「姊原」、「妹原」，還有「哥哥原」、「弟弟原」。不過，地圖上只有「姊原」跟「妹原」。

「楓葉谷健行隊」啓程後，別人在遊山玩水，我則是沿途看著地面，尋找考古遺存。在其中的三個地點，我發現了史前石器。回到所裡後，我就跟考古組組主任石璋如先生報告我的發現。當時，助理研究員不能向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提研究計畫，所以，石先生就說，他做計畫主持人，但由我來執行。

第一年，我在這個區域做全面調查，一共發現十九處遺址。其中，我覺得曲冰遺址的潛力最大，只要走幾步，就會發現陶片或石器。曲冰遺址位於河階地上。河岸是第一階，其上是第二階。姊原在曲冰遺址南方的第一階，而第三階就是曲冰遺址，大概不到兩公頃。面對濁水溪，正好是一個懸崖。第二年，我決定試掘這個地點。一打下去，就發現舊聚落的遺跡。有石柱礎，還有板岩石片鋪成的地板。

進行初步發掘後，就碰到一個問題，大概跟現在差不多。執行國科會計畫，十二月要結束，而且在十二月底以前，一定要把結案報告提出去，然後再提新一年的計畫。但是，審查差不多要三個月。所以，在這段空檔期間，遺址就荒廢在那裡。

因為曲冰是很重要的古代聚落，非常寶貴，我就把遺址保護起來，沒有回填。結果，中部的報紙報導了曲冰的考古工作。真是我的運氣。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1913-2006）先生，居然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消息。後來，我看孫院長的回憶錄，他提到，當時的臺灣一直都在發展理工，發展經濟，不太照顧人文。所以他就把關於曲冰報導的剪報，送給文建會。當時文建會的主任委員是陳奇祿先生，也是我的老師，他非常支持曲冰遺址的發掘。不過，當時文建會是幕僚單位，不是執行機構。所以，陳先生就請教育部安排。當時政府的經費充裕，所以教育部就規劃了一項三年計畫，提供 603 萬的研究經費。

李：當時，603 萬很多啊。

陳：那時候，不得了啊。所以，拿到這筆經費後，我的規劃是，前兩年，專門進行田野發掘。因為曲冰是古代聚落，所以發掘的面積比較大，共挖了 3,700 平方公尺。第三年，就打算專心寫報告。

每天，我們在田野裡工作，非常累人。我住在萬豐村，就是曲冰部落。裡面有一間雜貨店，老闆是漢人，娶了當地的原住民。他的房子很大，就租給我們三間房間，我跟兩位助理，一人一間。老闆娘幫我們做飯，有早餐，午餐帶便當，下班回去吃晚

飯。發掘地點原來則是一片田地，一部分是水田，一部分是旱田。地主非常好，旱田就休耕，讓我去挖。不過，我實在過意不去，就跟地主說，請他當田野工作的工頭，每天幫我安排十個工人就好，不用做事。他很客氣，他參加發掘，也管理工人。就這樣做了差不多兩年，中間來來去去。



圖 13：1981 年曲冰遺址的發掘



圖 14：曲冰遺址的發掘坑之一角

發掘完畢後，我就做個竹籬笆，把發掘地點圍起來。當時的南投縣縣長是吳敦義先生，他還來參觀，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還問我需要縣政府幫什麼忙。不過，後來保護曲冰的事，就懸在那裡。遺址被破壞，還長了草。之後，我每年去曲冰，還買了電動除草機，再找一名當地人幫忙除草。因為計畫結束了，沒有經費，所以我就自己貼錢做。就這樣維持了幾年。

李：大概多少年？

陳：大概有十年。不過，那是後話了。當時，我發掘了兩年以後，第三年秋天，就得到美國 Fulbright 獎學金，讓我去美國做研究十個月。因為我的研究題目是遺址維護，研究這個領域最有名的大學，就是 University of Arizona 跟 UCLA，所以，我在這兩所學校，各訪問了五個月。由於要去美國，所以就趕快申請，把曲冰的計畫延長一年。出國的那一年是一九八六年。

李：所以，這段時間，其實您也同時在進行國家公園考古學。

陳：對，同時進行。當時，我很忙，事情很多，又出國十個月。所以當時交的初步報告，比較簡略。後來，才在所裡發表正式的考古報告。²¹

另外，我剛剛提過，曲冰發掘完畢後，我差不多維持了十年。後來，當地人士還有縣議會就說，曲冰的維護，應該由縣政府負責，而且每年都要編列預算。我就建議，縣政府應該趕快蓋博物館，保護遺址。因為遺址中最精彩的部分，大概有一、兩千平方公尺，是可以復原的。不過，後來就沒下文了。我之前到美國學了一套遺址保護的方法，就用在曲冰遺址上。先在遺址發掘坑底層鋪上不織布，然後再鋪上沙，在最上面再鋪一層不織布。因為不織布有空隙，可以排水，但不會讓沙流失。鋪好後，直到現在，還是這情況，一直沒動過。但願曲冰遺址未來能成為遺址公園。

老實講，在臺灣發現的考古遺址中，其實最好的是卑南遺址。不過，很可惜，卑南遺址只留下一小部分。卑南遺址最精彩，東西也最多。然而，保存最完整的聚落遺址，還是曲冰遺址。這遺址於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經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公布為第 10 處國定考古遺址。

十四、海洋島嶼考古學

李：除了曲冰遺址的發掘，其實您也做過許多臺灣周邊島嶼的研究工作。怎麼會有這個機會？

²¹ 陳仲玉，《曲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

陳：在做國家公園調查時，我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也跟自然環境最有關係的，就是蘭嶼的研究。原本，政府要把蘭嶼設為國家公園。當時的觀念是，蘭嶼是個非常難得的地方，有人文史蹟，也有自然環境，可以成爲一個極佳的國家公園典範。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推出的「蘭嶼國家公園」計畫，在行政院已經通過了。可是，卻遭遇到地方人士的反對。他們認爲，要是蘭嶼變成國家公園，居民的生活會受到限制。此外，還有一部分的環保人士，也反對設置國家公園。另外，也有人文研究者反對，特別是做臺灣原住民研究的人。當地人反對，是因爲怕受到限制。他們其實不理解國家公園的用意，目的是爲了保護生態。

反對的結果，就是這個案子取消了。雖然取消，不過，我已經去蘭嶼做了研究。在我去蘭嶼之前，關於蘭嶼的研究非常少，而且從來沒有過考古學的遺址普查。我之所以對蘭嶼非常感興趣，是因爲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就是中研院民族所的劉斌雄先生，他是研究蘭嶼的專家，做過長期的研究。我們是圍棋棋友，經常一起下棋，他也常跟我談蘭嶼的事。我第一次去蘭嶼，是他帶我去的。我就跟著他調查，觀察他怎樣訪問當地人。

其實，我心裡一直有個想法：臺灣是個海島，但因爲政治的關係，臺灣人對島嶼的認識非常不足。全世界所有靠近海洋的人，都親近海洋，但是臺灣人不親海，爲什麼？日治時代限制很嚴，不讓人民隨便出港。後來，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來臺灣，政府控制更嚴了，人民根本不能到海邊。要是被阿兵哥發現，一定開罵，還會問你是誰？到海邊做什麼？然後叫你離開。所以，臺灣人最不親海。因此，當我看到生活在蘭嶼的民族，我認爲，他們是最典型的海洋民族。從古到今，保留親海的傳統。

此外，當時臺灣考古已經開始發展，不過，由於我注意到了蘭嶼，因此就想做「海洋島嶼考古學」。後來，我就接下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委託做蘭嶼普查的計畫。雖然在日治時代，已經開始在蘭嶼做些零星的工作，但沒有做普查。我是第一位到蘭嶼做考古學普查的人。一九八九年，我將研究結果寫成了《蘭嶼考古學初步調查》。²² 後來，內政部發



圖 15：在東沙島考古遺址發掘

²² 陳仲玉、楊淑玲、高韻華，《蘭嶼考古學初步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執行，1989）。

現，我們的南海地區，也就是東沙島跟南沙太平島，都沒有做過人文史蹟調查，所以就來委託我。²³南沙太平島我去過一次，東沙島去過不下十次。後來，金門也成立國家公園，我也做金門的考古學普查，寫過金門的調查報告。²⁴金門以前也沒有人研究過。



圖 16：南沙太平島的「南疆鎖鑰」碑

李：系統性地研究臺灣周邊的小島，是極具開創性的工作。所以，您研究了金門，後來又研究馬祖。

陳：對，後來就是馬祖。我是福州人，所以我一直很想研究馬祖。過去，文建會曾經舉辦考古人才培訓班。一九九六年的第四期，由何傳坤（1945-2015）先生主辦，在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行。我是講員之一。當時，我看到報名的名單裡，有一位是馬祖的王花倂先生，我特別去找他談話。後來，我帶兩位助理到馬祖，王花倂先生就帶我們到南竿走走，我越看越有興趣。認識王花倂先生沒多久後，二〇〇一年，我就跟劉益昌先生接下內政部第六次閩臺地區的考古遺址普查（第六期）計畫。這次普查的地點，就是金門跟馬祖兩縣。在王花倂先生的介紹之下，我認識了馬祖民俗文物館的潘建國館長。潘先生說，他正在籌劃興建馬祖民俗文物館。因為我對博物館事務非常有興趣，特別是文物保護，所以我跟他說，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找我。不過，他一直沒來找我。

二〇〇一年，我自史語所退休。二〇〇三年，因為我的兒媳婦申請到英國劍橋大學

²³ 陳仲玉，《東沙島南沙太平島考古學初步調查》（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1995）。

²⁴ 陳仲玉、董倫道，《金門地區考古遺址初步調查（一）》（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執行，1995）；陳仲玉、董倫道、黃信凱，《金門島考古遺址調查研究》（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1997）。

唸博士，還帶著我的孫女。我就想，反正已經退休，就帶著妻子到英國，照顧我的孫女，大概去了將近三個月。十一月回國後，才知道潘建國先生一直在找我。他說，馬祖民俗文物館要在二〇〇四年元旦開幕，希望當天下午，我可以做一場演講。馬祖是一個考古學的處女地，之前做普查時，也只發現幾處遺址。我想一想，就答應了他。那次的演講題目是「從考古學看馬祖的歷史」。或許是好奇吧，當天的聽眾很多。

後來，潘建國先生希望我給文物館建議。我說，文物館裡的展品非常欠缺，尤其是與歷史相關的展品極少。不過，因為之前在普查時，發現史前時代的熾坪隴遺址——由於當時尚未發掘，還無法確定遺址年代，現在知道了，距今 6,000 年左右。於是，我就建議，可以找機會進行田野發掘。挖出來的材料，就可以放在文物館裡。所以，在二〇〇四年與二〇〇五年，我們就發掘了熾坪隴遺址。後來，在蔡園裡又發掘了一次，裡面有個貝塚，堆積有兩公尺深，主要是歷史時期，發現從晚唐一直到元代的遺物，包括陶瓷器。我跟潘先生說，之後可以繼續做馬祖考古。二〇一一年，當時的連江縣縣長楊綏生先生跟我說，他們好像在亮島發現了貝塚。於是我就到馬祖去，後來就發現了「亮島人」。

十五、發現「亮島人」

李：亮島的考古發掘，應該是您另一項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陳：對我來說，亮島遺址真是非常意外的發現。²⁵ 前面說過，我剛退休，就認識馬祖人，也才開始研究馬祖考古學，包括熾坪隴與蔡園裡兩座遺址。亮島遺址則位於軍事管制區內，根本沒人知道。這個遺址破壞的最厲害，因為，軍方在遺址中央開了一條很寬的路，軍車可以雙向通行。旁邊還有個靶場。所以整個遺址被破壞了一大半，只剩下邊邊的一小塊。最寬的地方，也只不過 2 公尺左右，長度則有 30 公尺，是一處貝塚遺址，最厚之處，大概有 50 到 60 公分厚。²⁶

這個遺址最可貴之處，是因為發現了兩具「亮島人」，還有遺址的時代。第一具距今 8,320-8,160 年，臺灣沒有發現這麼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具則距今 7,620-7,570 年。許多考古發現的人骨，只保留頭骨，或是殘存牙齒的一小部分。然而，這是兩具完整的人骨。另外，根據碳 14 的測年結果，亮島遺址距今 8,300 年到 6,000 年，²⁷ 也就是說，可以跟馬祖熾坪隴遺址的年代上下銜接。

²⁵ 陳仲玉、邱鴻霖，《馬祖亮島島尾遺址群發掘及「亮島人」修復計畫》（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3）；陳仲玉，《亮島人 DNA 研究》（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3）；《馬祖列島的史前文化與「亮島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

²⁶ 此貝塚遺址即「亮島島尾 I 遺址」。

²⁷ 此定年結果，包括亮島島尾 I 遺址與島尾 II 遺址。陳仲玉、邱鴻霖，《馬祖亮島島尾遺址群發掘及「亮島人」修復計畫》，頁 189。



圖 17：亮島島尾 I 遺址（陳仲玉在看貝塚）

李：這兩具人骨還做了古 DNA。

陳：嗯，關於古 DNA，我要講兩個故事。當我第一次去亮島做調查時，除了發現貝塚，還包括陶片。我一看亮島出土的陶片，嚇了一跳，因為這些陶片絕對早於臺灣任何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陶片。當時，我對一起參與調查的工作人員說，幫我找大一點的貝殼。潘建國先生就撿起幾片看一看，問我說：「老師，很奇怪，這幾片怎麼那麼薄？」我一看，又嚇了一跳，就跟他說：「這是人頭骨啊！拜託，這可不得了！」我就問他在哪裡找到的？一看，還有其他骨頭。你想，怎麼這麼巧，人頭骨碎片就被潘先生撿到？我突然想到，這裡有人頭骨，那麼身體呢？是在被破壞的這一邊，已經沒了？還是仍在土裡埋著？所以，我趕快把部隊的隊長請來，跟他說，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找個大片的塑膠布，把這個區域蓋起來。我一定要來工作，一定要來做！隊長很熱心，立即幫我這個忙。後來，我就拿著人頭骨碎片，去找楊綏生縣長。其實，亮島遺址是他發現的。當時，由於已到年底，所以縣政府沒有多餘的經費。不過，楊縣長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調用第二預備金，請我馬上工作。我就把原來發掘熾坪隴的馬祖考古隊人員都找來，開始工作。

當然，我是有計畫的發掘。發掘的第一個坑，一定是從發現人頭骨旁的貝塚的上方往下挖。由於發掘地點就在懸崖邊，安全最要緊。所以，我在發掘地點旁邊，設置了四層護網。其次，因為我聽過許多考古出土的人骨被污染後又要做古 DNA 的事，所以往下挖到接近發現人頭骨的地方，我要求所有現場發掘人員穿上防護衣，以避免污染人骨。也許我的要求過分了一點，但是很有意思，我發現，自從我們發掘了「亮島人」之後，中國大陸的考古學家，也開始穿防護衣發掘人骨。這是第一個可談的故事。

第二個故事，就講到「亮島人」的古 DNA 研究。我這個人非常愛臺灣。當我發現「亮島人」之後，就希望「亮島人」的古 DNA，可以讓本土學者進行研究。不過，因為我不認識相關的研究人員，所以就去請教臧振華先生。臧先生說，我來得真巧。明天，恰巧高雄醫學大學的副校長葛應欽教授，跟他的兒子葛明軒先生，要去南科看臧先生發掘的標本。葛應欽教授是專門研究臺灣原住民 DNA 的學者。於是臧先生問我，要不要跟葛教授見一面？我說，太好了。於是，隔天我就去南科跟他們見面。後來，我才知道，葛應欽教授跟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人種遺傳學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MPI）的史同京（Mark Stoneking）博士有長年的合作關係。這個研究所的主任，就是二〇二二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帕博（Svante Pääbo）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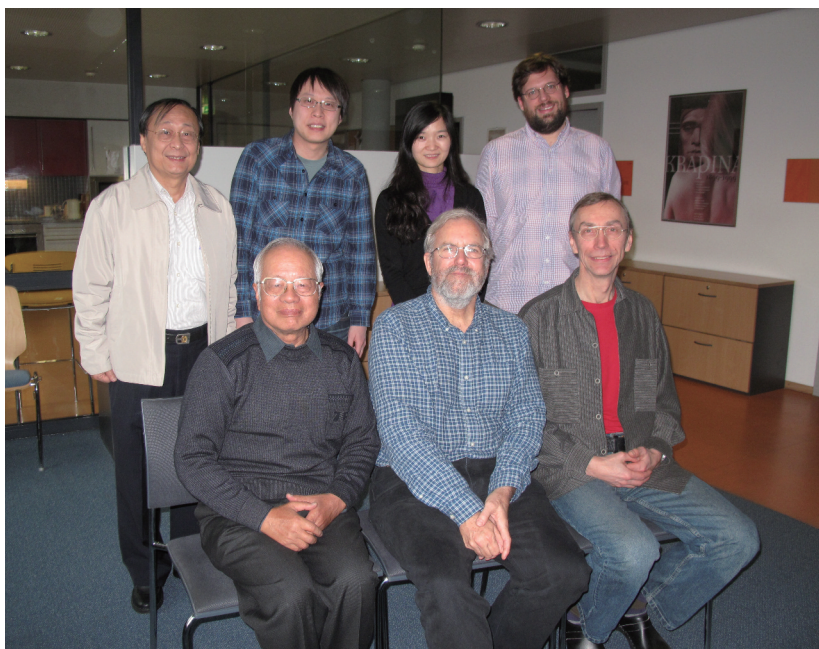


圖 18：Svante Pääbo（前排右），Mark Stoneking（前排中），陳仲玉（前排左），葛應欽（後排左一），葛明軒（後排左二），付巧妹（後排右二）在德國 MPI

李：對，我還看過您跟他的合照。

陳：是，我在臉書上還寫了一段。²³ 因為葛應欽教授跟 MPI 的美國學者 Mark Stoneking 有長年的合作關係，所以透過葛教授的協助，我們就與 MPI 簽訂合作備忘錄，讓他們做「亮島人」的古 DNA 研究。原本，我們只發現第一具，就讓他們做所有的檢驗，包括 Y-chromosome（Y 染色體）。當時就已成功做出單倍群（haplogroup）的分析，但 Y 染色體的分析結果一時做不出來。後來，我們又發現第二具「亮島人」，不但樣品抽取成功，而且分析也成功了。聽 Stoneking 說，抽取 DNA 非常困

²³ Jonas Chen,〈米老浮生瑣記 41：快樂就是居然與今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結緣〉（2022.10.04 發表）。

難，距今 1,000 年以上都很難，更不要說距今 8,000 多年前的。不過，話說回來，MPI 獲得諾貝爾獎的 Pääbo，連 40,000 年前的尼安德塔人的古 DNA 都能抽取成功！所以，我非常慶幸，找對了人，找對了地方。在臺灣考古學界裡，有人說，陳仲玉是福將，我想想也覺得很慶幸。

李：是，的確如此。

陳：剛剛講了第一具「亮島人」的發現，還有抽取古 DNA 的故事。另外，發現第二具「亮島人」，我覺得也是天意。當時，我們打完第一坑和第二坑之後，就準備打第三坑。比如說，第一坑和第二坑在遺址的最北邊，原則上，第三坑就要在最南邊，而這也是我們隊裡其他成員的意見。我說不行，第三坑應該還是要靠近第二坑。因為，首先，在第一坑和第二坑附近的堆積最密，東西一定最多。其次，因為第一坑已經發現第一具人骨，如果有其他人骨，可能就在附近。後來，就決定在第二坑旁挖第三坑。很幸運，我在第三坑挖到了「亮島人 2 號」，應驗了楊縣長所說：「老師，你再挖一個『亮島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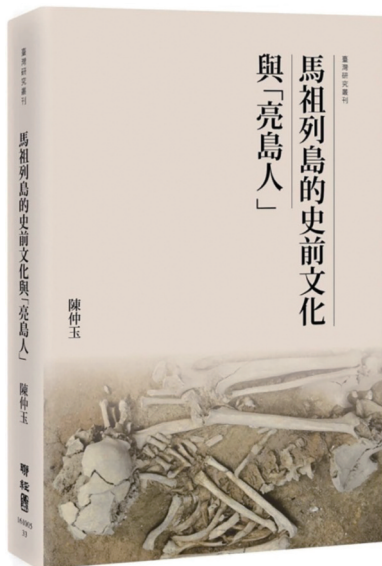


圖 19：馬祖列島工作的小結

李：所以第一具是「亮島哥」？

陳：對，第一具其實叫「海亮哥」。當我們在第三坑挖到大概到第四層、第五層時，我們的其中一位隊員，偷偷過來跟我說，在探坑的西北角，好像發現人的膝蓋骨。我聽到吃了一驚，決定趕快把坑擴大。不過，這個坑已經在懸崖邊了，所以決定只往外擴大 20 公分。原來的第一具人骨是屈肢葬，但第二具是直肢葬。所以，如果當時挖第三坑時，要是沒挖好，可能左膝蓋骨就不會發現。另外，若第三坑沒有向外擴大 20 公分的話，就碰不到第二具。

十六、一生的影響

李：最後，回顧一生，可以請您談談史語所對您個人的影響嗎？

陳：我這一生，完全是由史語所栽培出來的研究人員。當然，我的經歷有特殊的時代背景。高中畢業，才二十歲，我就進入史語所。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原本爲了生活，只想找份工作。後來慢慢會走上考古之路，就是因爲進了考古組，受到恩師們的栽培。每一位老師，對我有不同的影響。

我做了李濟先生六、七年的助理。一方面由於他逼得很緊，另一方面他也指示我怎麼找材料。看著李濟先生如何做研究，我也慢慢知道該怎麼選題目、怎麼找材料、怎麼寫文章。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術訓練，教導我做研究的基礎。

至於石璋如先生，他其實平常不怎麼跟我說話。不過，他的為人非常嚴謹，做學問鏗而不捨，田野工作十分認真。在田野中，他從基本測量學開始教起。比如，我要架測量用的平板，剛開始要花好多時間。不過，石先生一、兩分鐘就架起來。這可是基本功，因為他在安陽做得太多。

我受高先生的影響最大。我跟他很親近，因為經常跟他聊天，所以很多史語所的故事，都是從高先生那裡聽來的。鼓勵我最多的也是高先生，他也教我寫文章。高先生真是非常體貼的人。舉個例子。當初，我申請從技術人員轉任研究人員但事與願違，高先生曾經一度幫我安排好了故宮博物院的工作。在那段面臨挫折的日子，他還告訴我，說我的文章是頂尖的！後來，像前面提過的，我考上臺大碩士班，他也一直為我設想，要我把新買的機車趕快賣掉。其實，高先生不只是對我一個人好，他對他的學生們、晚輩們，都是鼓勵有加。

除了難得的恩師，史語所也提供給我良好的環境做研究。一方面，因為在史語所工作，讓我逐漸對考古學產生熱情，考古學也就成為我終生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正式成為研究人員後，由於當時政府正在推動興建國家公園，在此機會下，我開始進行國家公園的人文史蹟調查。之後，我便慢慢開始國家公園考古學與海洋島嶼考古學。我這一生的研究工作，就是在史語所裡發展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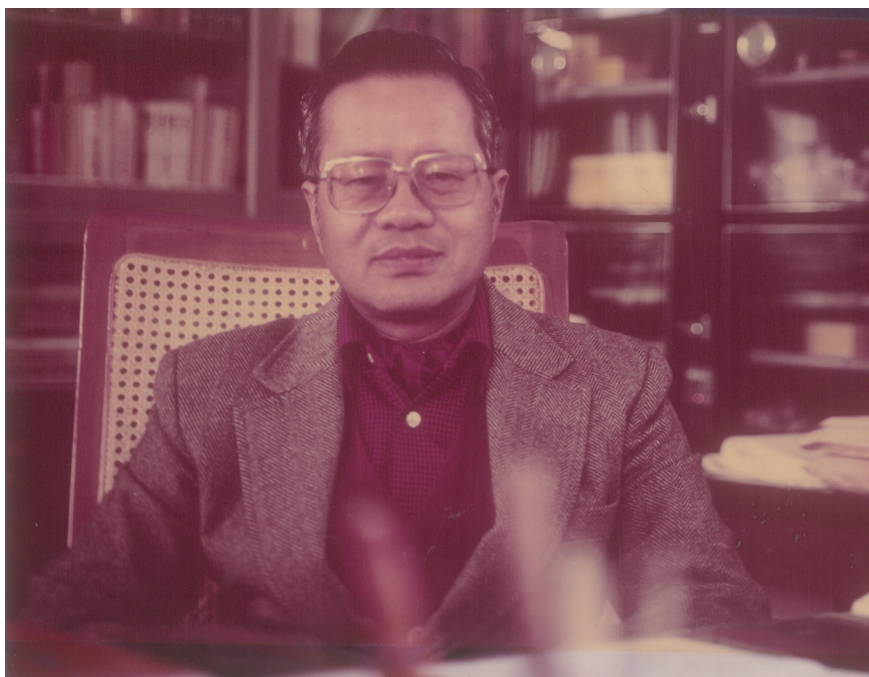


圖 20：2001 年退休時留影